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
作者：刘怡婷; 范洁琼; 陈斌斌

第一轮

审稿人1 意见：

论文采用共同命运模型来分析内在亲密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研究价值。先前的研究集中从单一的家庭系统来探讨养育机制，可能得到较为单一或片面的理解。研究问题的切入点较好，综合分析了不同家庭子系统对于协同养育的影响，结合婚姻质量和协同养育来开展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研究，并构建了跨层中介模型。但是在观点表述、论据支撑和结论推论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意见 1：共同命运模型是一种理论假设还是研究方式，作者从理论提出到研究模型都未能明确共同命运模型的基本内容和假设，“共同命运变量被建模为具有两个指标的潜在变量——每个二元成员的作答数据作为一个指标来进行分析（Galovan et al., 2017）”，这一句话似乎又将共同命运模型视为一种处理数据的方式。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对共同命运模型补充了明确的基本内容和假设，使其更加明确：

“共同命运模型是一种研究方式，基本假设是一个变量会影响关系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伙伴，这种影响对每个伙伴可能是相似的（共享的）或不同的（独特的）（Ledermann & Kenny, 2012）。此处研究变量称为共同命运变量，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在该变量的影响下彼此相似，产生相互依赖（Galovan et al., 2017）。共同命运模型基本内容是探讨群体层面上的相互依赖，模拟了群体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群体之间关系与发生的事情（Kenny, 1996; Ledermann & Kenny, 2012）。”

在家庭和亲密关系研究中，共同命运变量涉及夫妻双方。因此，本研究中采用共同命运模型收集夫妻双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即超越个体层面本身所提供的信息，通过将个体层面间看似独立的反应进行作用联结。夫妻双方数据作为二元水平潜在变量的可靠指标以此关注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二元水平关联（Wickham & Macia, 2019），模拟了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得出结论。“已有研究也表明，共同命运模型研究方式可以帮助研究家庭和亲密关系学者解释家庭层面因素对个人或家庭的影响（Galovan et al., 2017）。”

整体上看，共同命运模型可以帮助学者们探寻群体层面的相似性，并适当地解释群体层面影响的相关理论假设。

以上回答的共同命运模型的基本假设与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引言部分中（正文第3页），并用蓝色标明。

意见 2：其次从个体层面的结论，“婚姻质量越低的父母往往会出现更低的婚姻满意度

（Gottman, 1993b）”，直接推导出“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这样的推论有何依据？二元数据如何支持先前的研究结论，只有一种情况吗，还是可能有几种情况，比如婚姻质量可能是正向预测协同养

育,也可能是负向预测,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总之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文太少,更没有采用类似二元成员数据来开展调查的研究。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 此处呈现了文章中相关推论依据,并对此依据进行了更全面地支持说明。文章中已有相关推论依据:“婚姻质量是所有已探讨的影响因素中对协同养育最有效的预测源(Mangelsdorf et al., 2011),反映婚姻关系与质量的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良好的协同养育(Pedro et al., 2012)。研究也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父亲或母亲在体验到让自己感到满意、稳定的婚姻关系后,其更倾向于产生团结、一致的协同养育,减少在协同养育中的冲突和贬低行为,支持对方对子女的教学行为(卢富荣等, 2019)。”(正文第3页)

对相关推论依据支持说明:

1、“虽然大多支持理论的证据来源于个人层面的分析,但是其相关理论内容均是出于家庭或二元层面。”

2、对于婚姻质量,婚姻质量受到夫妻双方的影响,夫妻双方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是在婚姻关系中紧密联系;对于协同养育,协同养育受到父母双方的影响,与伴侣行为、家庭凝聚力等相互依赖的因素息息相关(卢富荣等, 2019);对于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的关系,婚姻质量不满意对父母引发的心理压力会降低他们对孩子需求的容忍度,缺乏协商的能力,最终导致不恰当的父母养育行为的出现(陈斌斌, 施泽艺; 2017),此均与夫妻双方有关。

3、“共同命运模型也使原在个人层面分析的概念得以在家庭/二元层面上重新概念化(Galovan et al., 2017),更精准地探索变量间的理论联系,在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研究中考虑更加周全。”这也正是本研究呼吁学者采用共同命运模型进行探索的原因,可以对之前非独立研究变量的研究进行更慎重地考虑。

因此,本研究梳理的推论依据在二元数据中可以适用,假设趋势可以保持不变。

(2) 目前,采用类似二元成员数据(共同命运模型或其衍生模型)来开展调查的研究有:

“在国外的家庭或亲密关系领域,例如,Preotu 和 Turliuc(2013)采用共同命运中介模型探寻伴侣沟通在伴侣相似性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Galovan 等人(2017)采用共同命运混合模型探寻家庭环境混乱如何相联系于夫妻冲突解决和儿童行为问题,以及 Brown 等人(2017)采用共同命运混合模型研究异性恋夫妇对色情制品接受、使用与性满足的关系。在国外的非家庭与亲密关系领域,例如, Li 等人(2020)采用共同命运模型探寻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感知的治疗联盟与咨询质量之间的关联。但是,目前国内还未有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

以上回答的补充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引言部分(正文第4页)中,并用蓝色标明。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 Brown, C.C., Carroll, J.S., Yorgason, J.B., Busby, D.M., Willoughby, B.J., & Larson, J.H. (2017). A common-fat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acceptance, use,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among heterosexual married coupl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6(2), 1–10.
- Li, X., O'Connor, S., Kivlighan, D. M., Jr., & Hill, C. E. (2020). “Where Is the Relationship” Revisited: Using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ing and Common Fate Model in Examining Dyadic Working Alliance and Session Quali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8(2), 194–207.

Preotu, I. D., & Turliuc, M. N. (2013). The common fate mediation model: does communication of ideal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l similarity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alele Științifice ale Universității „Alexandru Ioan Cuza” din Iași (serie nouă) – Psihologie*, 22(1), 103–118.

意见 3：对于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协同教养之间的作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较低的婚姻满意度与父母较低的教养能力感相关（Kwan et al., 2015），婚姻压力负向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van Eldik et al., 2017）”，婚姻质量包括较多影响因素，究竟是教养能力影响了婚姻质量，还是婚姻质量影响了教养能力？未能清晰地通过论据进行表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我们对婚姻质量部分进行了重述，使本研究内容更加清晰明确，

“婚姻质量通常包含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是对其组成家庭联盟的另一方成员是否满意的评估，其评估范围非常广阔（Schumm et al., 1986）。婚姻质量越低的父母往往会出现更低的婚姻满意度（Gottman, 1993b）。Fourmier 和 Olson（1983）也表明婚姻质量拥有不同侧面，包含对婚姻的满意度。根据本研究目的，婚姻满意度与父母协同教养关系密切（Pedro et al., 2012）。本研究选取婚姻满意度来考察夫妻间的婚姻质量，以更有力地揭示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教养间的关系。”（正文第 2 页）

（2）对于婚姻质量影响教养能力感的论据不够充分，我们对其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使婚姻质量与教养能力感间的关系探讨更加明确，

“家庭系统理论中的相互依赖概念表明父母教养子系统中角色的能力感与婚姻功能之间存在重要联系（Cox & Paley, 2003）。伴侣的支持感、婚姻维持行为和婚姻压力均被认为是教养能力感的重要预测因素（Suzuki, 2010; Merrifield & Gamble, 2013; van Eldik et al., 2017），家庭婚姻质量程度与父母教养能力感密不可分。对于属于教养能力感一部分的教养效能感，父母婚姻质量与其教养效能感存在正相关（Kwan et al., 2015），但是，母亲婚姻质量与父亲的教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随着母亲婚姻满意程度下降，父亲对养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程度增加（Kwok et al., 2013）。已有研究又表明，父亲婚姻质量可预测父亲教养能力感，父亲婚姻质量越高，其养育能力的感知越高（Bouchard & Lee, 2000）。那么，父母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有怎样的联系呢？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融于家庭中成为一体并相互影响，双方是否可以适应自己的角色在共同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到自己的教养能力呢？本研究将据此进一步探寻两者间的联系。”（正文第 6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Margolin, G., Oliver, P. H., Gordis, E. B., O'Hearn, H. G., Medina, A. M., & Morland, G. L. (1998). The nuts and bolts of behavioral observation of marital and family interactio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 195–213.

以上回答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引言部分中，并用蓝色标明。

意见 4：从数据结果来看，无论是父亲教养能力还是母亲教养能力的中介效应都很低，从结果分析和解释来看，也没有类似的研究结果来进行对照和支持，因此这个中介效应是否能够成立，或者说成立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较低的中介效应可能受到了何种因素的影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针对专家提出的“中介效应都很低”的问题，我们对中介效应较低的数据结果进行了补充说明，表明此中介效应可以成立并具有意义。与此同时，针对专家提出的“较低的中介效应可能受到了何种因素的影响”的问题，我们阐释了较低中介效应可能受到因素的影响，

“虽然从数据结果分析，本研究数据结果父亲教养能力感和母亲教养能力感的中介效应较低，但是其中介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说明这些路径中所带来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已有研究表明，产生占总效应较小的中介效应是可理解并且有意义的（叶宝娟 等, 2017），会由以下因素造成。首先，在社会科学中即使是小的效应量，在理论意义中也可能发挥重要效果。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是预测机制间存在的因素是否对其产生影响，而较少考虑到因素在影响机制间的绝对大小作用。因此，小效应得到检验理论的支持时也具备重要价值（Gall, et al., 2007）。其次，小效果量具有一定的重要实际意义（Ellis, 2010），方法学家认为，当比较广泛人群适应小效应结果，并具有直接或间接引发重大影响或随时间进程累积成大效应的可能性时，即使效应小也值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虽然本研究中中介效应相对于偏小，但当父母拥有较少教养能力感时依旧可能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即父母较少教养能力感的长期状态可能累积成大效应，因此，这种相对偏小的中介效应成立并且应该重视。”（正文第20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 Ellis, P. D. (2010). *The essential guide to effect sizes: Statistical power, meta-analysi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l, M. D., Gall, J. P., & Borg, W. R. (2007). *Educational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8th ed.)*. Boston, MA: Pearson.
- Ye, B.J., Fang, X.T., Yang, Q., Zhen, Q., Liu L.L., & Guo, S.Y. (2017). The Effects of Difficulti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Facial Negative Physical Self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2), 249–256.
- [叶宝娟, 方小婷, 杨强, 郑清, 刘林林, 郭少阳. (2017). 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与苦恼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2), 249–256.]

此外，我们未使用共同命运模型将父亲和母亲的数据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 Bootstrap（重复取样 3000 次））。结果发现，对于母亲数据，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08，95%的置信区间为 [0.04, 0.12]，中介作用显著；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破坏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8，95%的置信区间为 [-0.13, -0.04]，中介作用显著。对于父亲数据，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06，95%的置信区间为 [0.02, 0.10]，中介作用显著；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破坏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7，95%的置信区间为[-0.11, -0.03]，中介作用显著。虽然我们单独使用父亲或母亲的数据也可以得出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但是其中介效应均小于由共同命运模型所得出的父亲和母亲的共同所得的家庭层面的总的中介效应（婚姻质量通过父亲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对支持性协同养育的总中介效应为 0.13；婚姻质量通过父亲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对破坏性协同养育的总中介效应为-0.12）。

若将单独使用父亲或母亲的数据得出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效应相加，可以得到婚姻质量通过父亲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对支持性协同养育的总中介效应为 0.14，婚姻质量通过父亲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对破坏性协同养育的总中介效应为-0.15，其具有相比较大的中介效应。由此可知，共同命运模型从家庭层面出发减少了个人层面的误差，尽管效应相较更小，但是更加合理。

（2）针对专家提出的“从结果分析和解释来看未有类似研究结果进行对照和支持”的问题，我们在此补充了对照与支持的结果解释，

“从教养能力感作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分析发现，在国外，许多育儿计划重点关注于

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而通常很少关注父母认知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教养能力感是积极育儿的核 心（Dekovic et al., 2010）。虽然探寻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的研究较少，但是也有纵向研究发 现婚姻压力和父母教养能力感之间存在互惠关系（van Eldik et al., 2017）。在国内，教 养能力感中介效应的研究偏向将父母教养能力感分为教养满意度与教养效能感两部分以探 寻其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其存在的中介效应均较低（张晓 等, 2017; 邢凯 等, 2019; 柴彩 霞 等, 2020）。”（正文第 20 页）

“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教养能力感属于描述对自身教养者角色的能 力的感知（Johnston & Mash, 1989），相较于教养行为等难以意识并进行个人评估。并且， 教养能力感是在父母对儿童教养过程中产生的，其中中介效应可能不明显。但是，在认知层面 教养能力感引起的变化是会影响养育子女的成长，并且有效的教养行为与教养能力感相辅相 成（张晓 等, 2017），需要加以重视。Ohan 等人（2000）认为家庭生活中受父母控制或者 父母影响下的变量可能与教养能力感联结更强。因此，本研究探寻父母共同影响下的婚姻质 量与协同养育行为可以进一步凸显教养能力感带来的影响。”（正文第 20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Chai, C.X., Feng, X.Z., Liu, L.P., & Chen, H.X. (2020). Effect of parenting expectation on parenting stress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A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8(10), 1514–1518.

[柴彩霞, 冯喜珍, 刘丽萍, 陈红香. (2020). 小学生父母的期望与教养压力的关系:父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效应. *中国健康心理学 杂志*, 28(10), 1514–1518.]

Ohan, J. L., Leung, D. W., & Johnston, C. (2000). The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Evidence of a stable factor structure and validity.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u comportement*, 32 (4), 251–261.

Xing, K., Yang, S., & Chen, Y.W.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Husband Involvement: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7(5), 1012–1015+1011.

[邢凯, 杨莎, 陈毅文. (2019). 婚姻满意度对丈夫教养投入的影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5), 1012–1015+1011.]

Zhang, X., Li, L.F., Bai, L., & Chen, Y.H.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Adolescents' Prosocial and Problem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arents' Parenting Competence.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5(2), 240–249.

[张晓, 李龙凤, 白柳, 陈英和. (2017). 父母婚姻质量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2), 240–249.]

（3）针对专家提出的“缺少中介效应成立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我们对教养能力感的 中介效应成立的最大意义和价值进行说明，

“父母教养能力感和教养能力与子女发展紧密相关（Jones & Prinz, 2005），有助于帮助父 母不断地接受挑战和调动资源以实现育儿目标（Bandura, 1997）。缺乏教养能力感的父母不 仅表现出缺乏足够的教养能力，而且他们也会倾向于退出与孩子的互动，并放弃解决孩子 的问题行为（Coleman & Karraker, 1998）。并且，教养能力感已被证实为一重要的保护因素， 它可以缓冲不利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Jones & Prinz, 2005）。”（正文第 20 页）

“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关注针对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干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 能力感对教养行为有积极正向预测作用，同时它也可作为教养干预效果的有效指标（Dekovic et al., 2010; Turner et al., 2011）。由此，在家庭教育干预中，可以帮助家庭中协同教养能力不 佳的父母从婚姻关系是否存在危机与自我教养能力不足中反思，提升父母养育等自我效能感 与满意度，并引导夫妻双方肯定对方在育儿中的积极行为，使父母双方更愿意在共同教养孩 子过程中相互疏导、给予支持，以此也帮助提高夫妻婚姻质量与彼此的教养能力感，促进家

庭亲密度与提高家庭适应性，促进家庭健康发展，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Christina et al., 2019）。”（正文第 21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Coleman, P. K., & Karraker, K. H. (1998). Self-efficacy and parenting quality: findings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al Review*, 18(1), 47–85.

Turner, K. M. T., Nicholson, J. M., & Sanders, M. R. (2011). The role of practitioner self-efficacy, training, program, and workplace facto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vidence-based parenting intervention in primary care.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32(2), 95–112.

以上回答的重要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讨论部分中，并用蓝色标明。

意见 5：作者在数据收集上，追踪了一年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如何保证同一批次被试？在结果分析上，作者仅仅将 T1 和 T2 数据作为相关分析的依据，并且相关分析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内进行分析，这对于中介模型的建立有何特殊的意义？仅仅是通过相关数据的大小来判断适合共同命运分析，依据和判断标准是什么，并未在论文中进行介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本研究数据可以保证为同一批次被试，

“数据收集为两段时间（时隔一年）的集中收集，两次收集可以保证均为同一批次被试的入户调查。”（正文第 12 页）

（2）我们对于在结果分析上，相关分析在不同的时间点内进行分析以及对于中介模型的建立特殊的意义进行了补充说明：

“与此同时，相关分析在不同的时间点内进行分析可以探寻跨时间下各变量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纵向研究设计可以潜在地提供因果推断的依据，更清楚地了解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预测作用，而不是只有统计上的关联（Brown et al., 2017）。最重要的是，基于跨时间的中介模型建立后研究结果，可以将时间和家庭环境的变化对中介模型的影响加入理解中，探寻其产生长期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则是揭示了父母婚姻质量对其协同养育行为随时间的变化的影响“过程”机制，其中教养能力感为重要的影响途径。并且，本研究还在纵向共同命运中介模型下探寻了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家庭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使时间和家庭环境的变化影响考虑更加全面。”（正文第 22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Brown, C.C., Carroll, J.S., Yorgason, J.B., Busby, D.M., Willoughby, B.J., & Larson, J.H. (2017). A common-fat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acceptance, use,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among heterosexual married coupl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6(2), 1–10.

（3）共同命运分析相关数据的大小的依据和判断标准为，

“研究说明，标准化因子载荷的平方表示一个指标的方差被潜变量解释的比例，是对该指标可靠性的估计，可靠性越高，误差方差越小，此指标对潜变量的代表越佳（Ledermann & Kenny, 2012）。在两个指标的测量模型中，两个标准化因子载荷的乘积等于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若需要达到可靠的指标，两指标间的内相关度需要达到中等到高（Ledermann & Kenny, 2012）。当此相关性很弱时会出现严重的估计困难，同时也缺少证据说明存在共同的潜在变量。因此，在采用共同命运模型之前，研究者应该检查两个成员涉及的潜在变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是否稳健，相关系数至少达到 0.20（Ledermann & Kenny, 2012）。本研究相关性判断标准设为了 0.50，符合两指标间的内相关度需要达到的中等以上，并且是在一定程度

上比共同命运模型的传统限制更严格,形成在概念与实际中更直观以及更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混合模型(包含个人层面和家庭/二元层面)进一步分析(Wickham & Macia, 2019)。”(正文第 13 页)

以上回答的重要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对应部分中,并用蓝色标明。

意见 6: 从结果讨论部分来看,未能深刻从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两个视角来提炼观点,因此较难分析较之先前研究有何突出性贡献和创新。既然论文强调是个体视角和家庭视角的共同命运模型,但是在观念提出的地方,未能明确个体与家庭是如何实现共同命运模型的中介效应的。在何种程度上二者是统一的,何种条件下二者可能不具备共同命运模型的作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 本文针对个体层面与家庭层面的两个视角进行了观点的提炼,对文章讨论内容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具体内容如下,

“已有研究在个人层面表明,父亲的婚姻满意度稳定地预测了父亲的协同教养行为、母亲的婚姻满意度也同样对母亲的协同教养行为具有稳定的预测效应(陈玲玲 等, 2014)。同时,根据交叉假说,即父母中的一方在夫妻子系统感受或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在家庭中其他子系统感受与行为(White, 1999),可以知晓双方存在相互影响与依赖。

从家庭层面来看,婚姻质量是夫妻双方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父母感知的整体婚姻质量具有相互依赖性。并且,在家庭中,父母双方在共同抚养关系中均需有较大的养育投入,协同养育是夫妻双方和家庭环境共同构建的结果(Sarah et al., 2016),父母协同养育在家庭中相互影响,并共同调节着家庭互动(Minuchin, 1974)。

因此,有必要使用共同命运模型在家庭层面去探寻相互影响的双方相似的(共享的)或不同的(独特的)感受与行为——家庭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父母协同养育,使家庭与亲密关系间的研究更加缜密(Ledermann & Kenny, 2012)。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对其进行了整体分析,其中将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作为共同命运变量。研究表明,良好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促进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减少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并验证了共同命运模型在家庭层面研究中的应用具有一定合理性,启示研究者使用父母双方的数据在家庭层面进行研究探讨。”(正文第 21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Chen, L.L., Wu, X.C., & Liu C.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Father Involvement: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arenting.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0(3), 268–276.

[陈玲玲, 伍新春, 刘畅. (2014). 父母的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父母协同教养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3), 268–276.]

White, L. (1999). Contagion in family affection: Mothers, fathers, and young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2), 284–294.

同时,我们对本研究相较之前研究突出贡献与创新的点进行了说明,

“相较于以往研究,过去从个体层面探讨家庭层面的问题是不适宜的,至少在统计上是存在问题的,其忽视了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其实是片面的。本研究的贡献之处在于运用高级的研究方式,也就是共同命运模型,更加正确的去分析家庭问题。

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家庭层面良好的婚姻质量以及父亲和母亲个体层面对教养能力感理解认知的间接影响,探寻了对家庭整体的协同教养的影响机制,侧面助力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健康成长。从理论意义上,本研究基于家庭层面的理论基础,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依据，并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命运模型的发展。从实践意义上，本研究从家庭层面与个人层面共同思考，帮助有孩子的家庭成员通过维护良好的婚姻关系，提升自身的教养认知，以及促进父母间的协同养育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正文第 18 页）

（2）我们在观点提出的引言部分，我们增添了以下部分以明确个体与家庭是如何实现共同命运模型的中介效应的，

“对于双方或多方成员都影响变量的研究，共同命运模型值得更多的关注。从理论上可知，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可以代表群体层面的现象，其共同命运变量也既可以代表双方在变量上的相似性，双方指标上的潜在变量中不同的残差也可以描述为共同命运变量所不能捕捉的个人内部的独特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法的使用将更好地符合理论假设，并在家庭 and 关系研究的许多实质性领域的研究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理解。”（正文第 7 页）

“由于教养能力感评估的是父母双方个人的养育认知，而不属于一个共享的家庭层面，即不是一个共同命运变量，其需要在个人层面进行分析。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研究者也可以通过两指标间的内相关度来再次确认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变量。当父母双方报告相同变量的指标间具有高相关性时，可以表明其拥有大量共同变异，因此可以预计产生可靠的处于家庭/二元层面的共同命运的估计（Ledermann & Kenny, 2012）。当父母双方报告指标间相关性较低时，该变量可以不进行共同命运的分析，将其依旧处于个人层面进行探讨。”（正文第 7 页）

（3）同时，我们在观点提出引言部分对使用共同命运模型的条件也进行了补充说明，“根据 Ledermann 和 Kenny（2012）提出的采用共同命运模型的两个先决条件表明，（1）共同命运变量是必须对双方成员产生影响的变量；（2）可以观察到的数据必须是潜在共同命运变量的可靠指标。”（正文第 4 页）

此外，我们对个体层面与家庭层面进行统一的情况补充了说明，

“Bronfenbrenner（1988）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家庭成员的不同经历共同塑造了家庭的生态环境和氛围，它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各个成员的发展和变化轨迹（陈斌斌 等, 2016）。家庭层面的作用机制最终会落到个体层面，而个体层面又会反过来影响家庭层面，形成一种循环，两者由此可达成融合统一。”（正文第 7 页）

以上回答的重要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对应部分中，并用蓝色标明。

审稿人 2 意见：

该论文基于共同命运模型（the common fate model, CFM）进行了家庭亲密关系与协同教养行为的跨层中介分析，研究颇具创新性，文字表述总体比较顺畅，研究设计较严谨。

论文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包括：

意见 1：婚姻质量好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不同类型的协同教养，但协同教养的落脚点应该是孩子的发展状况，为何在该研究中未涉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本研究主要关注于家庭层面的夫妻亲密关系与协同行为中，所以未有最终落脚于孩子的发展状况，本文在讨论部分就婚姻质量对孩子的影响进行了说明，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婚姻质量不高，婚姻冲突较多的家庭中，父母婚姻质量会影响他们教养孩子目标的一致性，教养规范与策略上的统一性，导致孩子不知所措（马梅芬 等，2017）。并且，父母容易将婚姻中未处理完的敌意与矛盾蔓延到对孩子的教育中，更容易对孩子严厉教养，忽略对孩子的身心进行关爱，导致孩子产生不安全依恋，从而产生问题行为（池丽萍，王耘，2002）。并且，研究表明，父母较低的婚姻质量会影响孩子的内化行为，包括焦虑、抑郁、退缩等（何筱荷，侯金芹，郭菲，陈祉妍，2021），对孩子身心发展、学业成就、人际交往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Yap & Jorm, 2015）。”（正文第 19 页）

（2）同时，本次修改对其在讨论部分对于不同类型的协同教养对孩子的影响以及教养效能感对孩子的影响进行了补充，

“父母支持性协同养育易在增加双方沟通与共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增强孩子安全感，减少孩子问题行为；父母破坏性协同养育易在双方关系紧张与敌对行为滋生的过程中，导致孩子情绪调节异常、社会适应不良，让孩子产生极大压力，激发其焦虑与抑郁等问题（刘丹丹，2018）。父母的协同养育配合需要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情感氛围，增强家庭成员的凝聚力，以此共同应对孩子出现的各种问题，降低孩子问题发生风险（卢富荣 等，2019）。”（正文第 19 页）

“本研究关注教养能力感的中介效应对价值在于父母教养能力感和教养能力与子女发展紧密相关（Jones & Prinz, 2005），有助于帮助父母不断地接受挑战和调动资源以实现育儿目标（Bandura, 1997）。缺乏教养能力感的父母不仅表现出缺乏足够的教养能力，而且他们也会倾向于退出与孩子的互动，并放弃解决孩子的问题行为（Coleman & Karraker, 1998）。”（正文第 20 页）

（3）最后，在研究不足之处，我们将专家的建议作为未来研究一个重要的方向。

“协同教养研究应该最终落脚于孩子的发展，可进一步延伸其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且将我们的理论模型所强调的家庭互动机制作用延伸到儿童个体层面的具体发展。另外随着三孩政策开放，我们甚至可以探讨二元甚至三元的同胞关系是如何收到父母二元关系的影响。这些都将称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正文第 22 页）

以上回答的重要内容（引号部分）已补充在文章的讨论部分中，并用蓝色标明。

意见 2：被试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总体较高，如果换一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试，是否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例如可能影响被试的教养能力感，作者对此如何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我们对本研究换一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试带来的影响问题，查询了相关文献，作出以下回答：

（1）对于探索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的关系，刘丹丹（2018）有关父母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的研究中显示，当被试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总体较低（父亲与母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占比最高，均为 34.1%，本科或本科以上分别占比 23.1%、22.1%；家庭月收入 3000~6000 元占比均最高，为 46.2%，6000 元以上占比 33.2%）时，父亲或母亲的 T1 时间婚姻质量负向预测 T2 时间冲突和贬低协同养育，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被试在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的关系间具有一致性。

（2）对被试的教养能力感的影响方面，有待考虑被试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在未来进一步探索。查询相关文献可知，在教养能力感量表在中国父母中研究显示，高中或中专以下父母的教养能力感高于大专及以上父母的教养能力感（彭咏梅 等，2012），但这与国外研

究不一致（Gilmore & Cuskelly, 2010）。因此，本研究认为未来可关注不同文化程度与收入水平的父母教养能力感是否会带来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对于考虑被试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并在研究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

“参与本研究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均较高，有待探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是否产生不同结果”。此处引号部分已补充在讨论部分的不足中（正文第 23 页），并用蓝色标明。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Liu, D.D. (201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co-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Master Dissertation). Shanxi University.

[刘丹丹. (2018). 父母婚姻质量、协同教养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大学.]

Peng, Y.M., L, Qing., & Zhou, S.J. (2012). Factorial Structure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in Chinese Par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 162–164+210.

[彭咏梅, 刘琴, 周世杰. (2012). 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在中国小学生父母中的因素结构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 162–164+210.]

Gilmore, L., & Cuskelly, M. (2010).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using a normative sample. *Child Care Health & Development*, 35(1), 48–55.

意见 3：建议作者对文中的模型图进一步改善，目前的模型图似乎不够美观。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对模型图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使其更加美观。

各个模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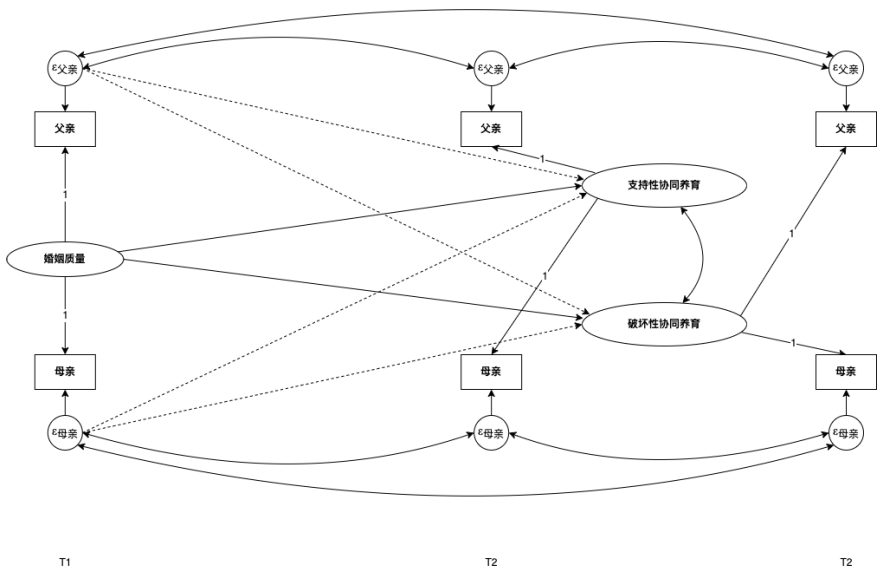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基本共同命运模型的假设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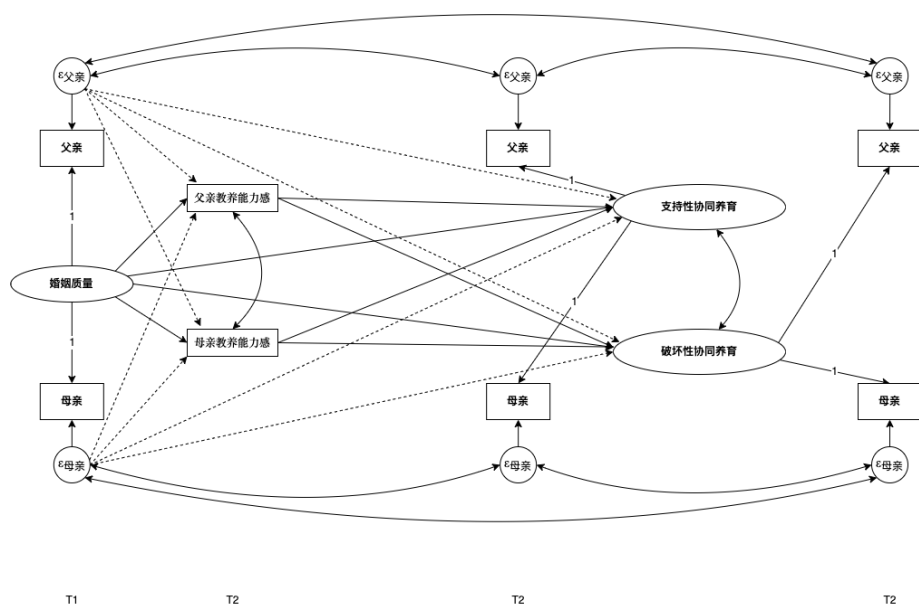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假设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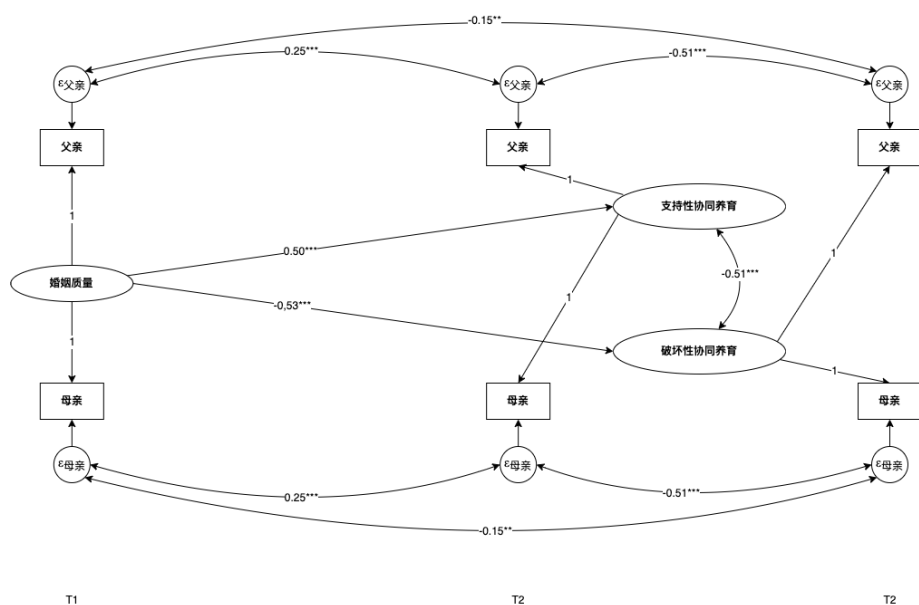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基本共同命运模型的假设模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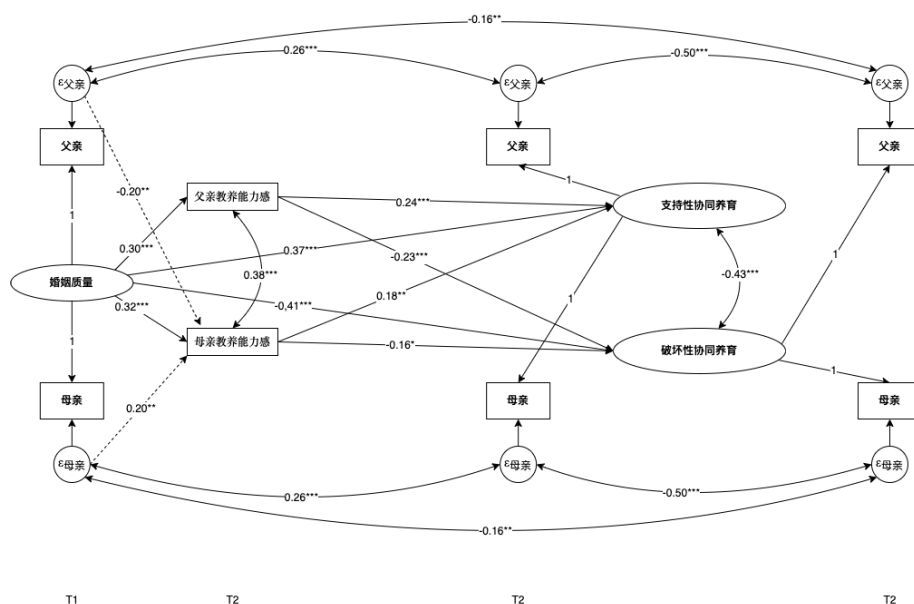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假设模型结果

意见 4: 另有一些文字表述或者量表表述的问题具体见论文批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论文批注的一些文字表述问题均已经在文章中修改, 并标记为蓝色字体。

其中, 引言部分已经补充国内的已有研究说明协同教养对儿童发展的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 协同教养对儿童的认知 (Cabrera et al., 2012)、情绪情感 (Teubert & Pinquart, 2011) 及问题行为 (Chang et al., 2004; Riina & McHale, 2014; 卢富荣 等, 2019) 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正文第 2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Chang, L., Lansford, J.E., Schwartz, D., & Farver, J.M. (2004). Marital quality, maternal depressed affect, harsh parenting, and child externalising in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4), 311–318.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建议接受。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时间。

审稿人 2 意见:

之前的问题已得到较好的回应和修改。文中尚有个别文字表达上的错误, 请加以核查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时间。

我们已经对文章内容进行了核查，对表达不当与错误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使内容更加严谨和准确，具体如下。

引言部分：

（1）“婚姻质量通常包含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是对其组成家庭联盟的另一方成员是否满意的评估，其评估范围非常广阔（Schumm et al., 1986）”，改为“婚姻质量通常包含夫妻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对组成家庭联盟的另一方成员是否满意的评估（Schumm et al., 1986）”。（正文第 2 页）

（2）“共同命运变量被建模为具有两个指标的潜在变量——每个二元成员的作答数据作为一个指标来进行分析”，改为“共同命运变量通常被建模为具有两个指标的潜在变量——每个二元成员的作答数据作为一个指标来进行分析”，表述更加严谨。（正文第 3 页）

（3）“从人格特质角度分析，研究表明，个体人格特质对婚姻关系感知既存在主体效应（the Actor Effect）的影响（Kenny, 1996），又存在会受到另一方人格特质的客体效应（the Partner Effect）的影响（陈媛 等, 2020），夫妻作为婚姻共同体，婚姻质量受到夫妻双方的影响，婚姻质量属于共同命运变量，并可以作为可靠指标。由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模型（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Model）将配偶的人格概念化为“环境”可知，配偶的人格可以与自身的人格相互作用，以相互影响行为（Zayas et al., 2002），父亲与母亲的协同养育行为会受到相互影响，父母协同养育属于共同命运变量，并可以作为可靠指标。”

优化为，“从人格特质角度分析，个体人格特质对婚姻质量的感知既存在主体效应（the Actor Effect）的影响（Kenny, 1996），又存在对方客体效应（the Partner Effect）的影响（陈媛 等, 2020）。夫妻作为婚姻共同体，夫妻双方影响婚姻质量，婚姻质量属于共同命运变量。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感知的作答可以作为可靠指标。由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模型（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Model）可知，配偶的人格可以与自己的人格相互作用，以相互影响行为（Zayas et al., 2002）。父亲与母亲的协同养育行为会受到相互影响，父母协同养育属于共同命运变量。父母双方对协同养育的作答可以作为可靠指标。”（正文第 4 页）

（4）“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融于家庭中成为一体并相互影响，双方是否可以适应自己的角色在共同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到自己的教养能力呢？”，改为“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双方融于家庭相互影响，是否会更适应自己的角色并在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呢？”（正文第 6 页）

方法部分：

（1）“父母中一位成员的婚姻满意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婚姻满意度越高，婚姻质量越佳”，改为“父母中一位成员的婚姻满意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佳”。（正文第 11 页）

（2）“评估了父母配偶在个人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行为”和“评估了父母配偶在个人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行为”，改为“评估了父母配偶的支持性协同养育行为”和“评估了父母配偶的破坏性协同养育行为”。（正文第 11、12 页）

讨论部分：

（1）“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家庭层面良好的婚姻质量以及父亲和母亲个体层面对教养能力感理解认知的间接影响，探寻了对家庭整体的协同教养的影响机制，侧面助力孩子在

家庭环境中的健康成长”，改为“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家庭层面良好的婚姻质量和父母个体层面教养能力感的理解认知，探寻了对家庭整体的协同教养的影响机制，侧面助力孩子在家庭中的健康成长”。（正文第 18 页）

（2）“对于婚姻质量，夫妻双方婚姻经营的理念与行为的一致性与冲突均会受到夫妻双方的影响。”改为“对于婚姻质量，夫妻双方婚姻经营时的理念与行为是否一致或是否产生冲突，均受到夫妻双方的影响。”（正文第 18 页）

（3）“在这类干预中需要关注夫妻关系的变化，增加夫妻之间良性互动的引导，并及时强调夫妻双方婚姻经营对孩子养育的影响，注重婚姻与家庭教育，通过父母双方理性沟通与积极卷入，调整共同的育儿行为，避免家庭关系的恶化”，改为“在这类干预中，咨询师需要关注夫妻关系的变化，增加夫妻之间良性互动的引导，并及时强调夫妻双方婚姻经营对孩子养育的影响，注重婚姻与家庭教育。通过父母双方理性沟通与积极卷入，父母共同调整育儿行为，避免家庭关系的恶化”。（正文第 19 页）

（4）“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是预测机制间存在的因素是否产生影响，而较少考虑到因素在影响机制间的绝对大小作用。因此，小效应得到检验理论的支持时也具备重要价值（Gall, et al., 2007）。其次，小效果量具有一定的重要实际意义（Ellis, 2010），方法学家认为，当比较广泛人群适应小效应结果，并具有直接或间接引发重大影响或随时间进程累积成大效应的可能性时，即使效应小也值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改为“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是预测机制间存在的因素是否产生影响，而忽略考虑因素在影响机制下的绝对大小作用，得到验证理论支持的小效应也应该具备重要价值（Gall et al., 2007）。其次，在实践中，小效果量在一定程度下会产生重大影响（Ellis, 2010），方法专家表示，当较多人群适应小效应的结果，或者小效应可能随着时间的历程逐渐累积为大效应，或者小效应会直接或间接引发严重影响时，即使效应小也值得研究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正文第 20 页）

（5）“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教养能力感属于描述对自身教养者角色的能力的感知（Johnston & Mash, 1989），相较于教养行为等难以意识并进行个人评估”，改为“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教养行为，教养能力感属于描述个人教养孩子时身份能力的感知，难以意识，并需要进行个人评估（Johnston & Mash, 1989）。”（正文第 20 页）

（6）“由此，在家庭教育干预中，可以帮助家庭中协同教养能力不佳的父母从婚姻关系是否存在危机与自我教养能力不足中反思，提升父母养育等自我效能感与满意度，并引导夫妻双方肯定对方在育儿中的积极行为，使父母双方更愿意在共同教养孩子过程中相互疏导、给予支持，以此也帮助提高夫妻婚姻质量与彼此的教养能力感，促进家庭亲密度与提高家庭适应性，促进家庭健康发展，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Christina et al., 2019）。”

改为“由此，在家庭教育干预中，咨询师可以帮助家庭中协同教养能力不佳的父母从婚姻关系是否存在危机与自我教养能力不足中进行反思，提升父母养育的自我效能感与满意度，并引导夫妻双方肯定对方在育儿中的积极行为，使父母双方更愿意在共同教养孩子过程中相互疏导、给予支持，也以此帮助提高夫妻婚姻质量与彼此的教养能力感，促进提升家庭亲密度与家庭适应性，维护家庭稳定发展，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正文第 21 页）

(7) “并且, 在家庭中, 父母双方在共同抚养关系中均需有较大的养育投入, 协同养育是夫妻双方和家庭环境共同构建的结果 (Sarah et al., 2016)”, 改为“在家庭父母双方抚养孩子中, 父母双方均需较大的养育投入, 协同养育是双方与家庭环境共同构建的结果 (Sarah et al., 2016)。” (正文第 21 页)

第三轮

编委意见:

我已经看了该篇文章和外审的意见, 认为作者已经针对外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较为仔细的修改, 但还有一些我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的问题见附件批注处。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的时间与宝贵意见。

我们已经对文章还需要修改的内容进行了完善, 具体内容如下。

意见 1: “采用问卷法分两个时间段 (T1, T2; 间隔 1 年) 收集数据, 最终得到 650 个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满意度问卷 (T1), 教养能力感问卷 (T2) 和协同养育感知问卷 (T2) 数据进行分析。”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我们对此补充修改为“采用问卷法分层整群抽取上海市幼儿园中孩子 (平均年龄 5.14 岁, 年龄范围 4~7 岁) 的父亲与母亲参与调研, 共分两个时间段 (T1, T2; 间隔 1 年), 最终得到 650 个家庭的父亲、母亲婚姻满意度问卷 (T1), 教养能力感问卷 (T2) 和协同养育感知问卷 (T2) 数据进行分析。” (正文第 1 页)

意见 2: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夫妻婚姻满意度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显著下降 (Gottman & Notarius, 2002), 而父母良好的婚姻质量是维持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不仅影响着夫妻双方自身的状态, 还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我们对 Gottman 实证研究发现的相关表述修改为“Gottman 和 Notarius (2002) 研究表明, 夫妻婚姻满意度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显著下降”。此外, 我们已对该处后半句补充了参考文献, “而父母良好的婚姻质量是维持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不仅影响着夫妻双方自身的状态, 还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Erel & Burman, 1995; 王斯麒等, 2022)。” (正文第 2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108–132.

Wang S.Q., Zhao B.X., Wu H., & Liu W. (2022). The Effects of Marital Quality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Parental Positive Emotion Expression, Parenting Behavior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8(3), 323–330.

[王斯麒, 赵彬璇, 吴红, 刘伟. (2022). 婚姻质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3), 323–330.]

意见 3: “Fourmier 和 Olson (1983) 也表明婚姻质量拥有不同侧面, 包含对婚姻的满意度。”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我们已对文章使用婚姻满意度代表婚姻质量进行了说明, 并对整体表述与逻辑进行了重新梳理, 具体如下。

批注 [A1]: 需要说一下被试是如何选取的? 是孩子属于哪个年龄的父母?

批注 [A2R1]: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已对被试的选取与具体信息进行完善, 并放入文章中。

批注 [A3]: 这应该不是这个理论提出来的观点, 而是 Gottman 他们的实证研究的发现

批注 [A4R3]: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已对文章内容表述进行完善, 并放入文章中。

批注 [A5]: 这些地方应该加一些参考文献

批注 [A6R5]: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已在此处补充参考文献放入文章中。

批注 [A7]: 既然是不同侧面, 就不应该只有婚姻满意度, 另外, 如果包含不同侧面, 为何本研究就只使用了婚姻质量中的婚姻满意度来代表婚姻质量? 需要作者做出说明

批注 [A8R7]: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 已对文章使用婚姻满意度代表婚姻质量进行了说明, 并整体进行了逻辑梳理, 放入文章中。

“婚姻质量通常包含夫妻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对组成家庭联盟的另一方成员是否满意的评估（Schumm et al., 1986; Fourmier & Olson, 1983）。婚姻质量越低的父母往往会出现更低的婚姻满意度（Gottman, 1993b）。大多婚姻研究学者选择使用婚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标准（Gottman & Notarius, 2002; 邢凯 等, 2019; 杨晓静 等, 2021），强调个体对自身婚姻质量的主观感觉，聚焦于婚姻总体的评价。并且，研究已表明，婚姻满意度与父母协同教养关系密切（Pedro et al., 2012）。根据本研究评价婚姻整体情况的需求和研究目的，本研究选取婚姻满意度来考察夫妻间的婚姻质量，以更有力地揭示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教养之间的关系。”（正文第 2 页）

此外，对于“婚姻质量涉及的不同侧面”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不足之处将专家的建议作为未来研究继续探索的重要方向，具体为，“对于婚姻质量还涉及的不同侧面，例如夫妻角色平等、夫妻沟通等（Fournier & Olson, 1983），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婚姻中各方面对家庭所带来的影响。”（正文第 24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Yang, X.J., Guo, F., & Chen, Z.Y. (2021).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Father Involv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Expressiven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res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9(2), 272–276.

[杨晓静, 郭菲, 陈祉妍. (2021). 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积极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及教养压力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2), 272–276.]

意见 4:“婚姻质量是所有已探讨的影响因素中对协同养育最有效的预测源（Mangelsdorf et al., 2011），反映婚姻关系与质量的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良好的协同养育（Pedro et al., 2012）。研究也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父亲或母亲在体验到让自己感到满意、稳定的婚姻关系后，其更倾向于产生团结、一致的协同养育，减少在协同养育中的冲突和贬低行为，支持对方对子女的教养行为（卢富荣 等, 2019）。”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对 10 多年前类似的研究不足进行了说明，并对此研究与之前类似研究相比的新意进行了强调，具体如下。

“婚姻质量是所有已探讨的影响因素中对协同养育最有效的预测源（Mangelsdorf et al., 2011），反映婚姻关系与质量的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良好的协同养育（Pedro et al., 2012），但研究者在家庭层面提出探讨共同育儿的问题后，具体分析却在父、母两类个人层面的模型进行。研究也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父亲或母亲在体验到让自己感到满意、稳定的婚姻关系后，其更倾向于产生团结、一致的协同养育，减少在协同养育中的冲突和贬低行为（卢富荣 等, 2019）。该研究从家庭层面提出问题，虽然将父母具体分析体现于一个模型中，但是仍在探讨父母个人层面间的影响。本研究则进一步从家庭层面对两者间的关系提出问题与具体分析。”（正文第 3 页）

意见 5: “已有研究表明，共同命运模型研究方式可以帮助研究家庭和亲密关系学者解释家庭层面因素对个人或家庭的影响（Galovan et al., 2017）。国外的家庭或亲密关系领域，例如，Preotu 和 Turliuc（2013）采用共同命运中介模型探寻伴侣沟通在伴侣相似性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Galovan 等人（2017）采用共同命运混合模型（包含个人层面和家庭/二元层面）探寻家庭环境混乱如何相联系于夫妻冲突解决和儿童行为问题，以及 Brown 等人（2017）采用共同命运混合模型研究异性恋夫妇对色情制品接受、使用与性满足的关系。在国外的非家庭与亲密关系领域，例如，Li 等人（2020）采用共同命运模型探寻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感知的治疗联盟与咨询质量之间的关联。但是，目前国内还未有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

批注 [A9]: 似乎已经有研究者在 10 多年前就做过了类似的研究，那需要说明这个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又何新意

批注 [A10R9]: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已对此研究与 10 多年前类似的研究相比的新意进行了说明与强调，并放入文章中。

批注 [A11]: 有没有研究证明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比个体层面的因素具有更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比较研究，那相当于还是各说各话

批注 [A12R11]: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已有研究对使用共同命运模型与未使用共同命运模型的个人层面研究进行了比较，以此说明了采用共同命运模型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作用，具体内容已补充在文章中。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已有研究对使用共同命运模型与未使用共同命运模型的个人层面研究进行了比较，以此说明了采用共同命运模型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作用，具体修改与补充如下。

“在国外的非家庭与亲密关系领域，Li 等人（2020）采用共同命运模型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Kenny & Ledermann, 2010）探寻了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感知的治疗协作联盟与咨询质量之间的关联。

对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它也是探索二元关系中相互依赖，对成对数据进行分析，但仍是聚焦个体内与个体间效应的个人层面研究（Kenny & Ledermann, 2010; 刘畅 等, 2016）。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更好地捕捉到每一个二元成员的感知如何取决于自己与对方的感知，而共同命运模型更好地捕捉与强调二元成员共同认知的影响（Li et al., 2020）。研究表明，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感知的治疗协作联盟能显著预测咨询质量，其效应大小明显大于个人认知，并反映了治疗过程中合作与共识的重要（Li et al., 2020）。目前，国内已有研究采用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对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之间的影响进行了个人层面的探索（刘畅 等, 2016），但仍未有对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间更精准的家庭共同感知层面的探索。同时，国内还未有采用共同命运模型的相关研究，有待本土化深入。”（正文第 4 页）

此处涉及新的参考文献为：

Kenny, D. A., & Ledermann, T. (2010). Detecting, measuring, and testing dyadic patterns i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 359–366.

意见 6：“家庭系统理论中的相互依赖概念表明父母教养子系统中角色的能力感与婚姻功能之间存在重要联系（Cox & Paley, 2003）。伴侣的支持感、婚姻维持行为和婚姻压力均被认为是教养能力感的重要预测因素（Suzuki, 2010; Merrifield & Gamble, 2013; van Eldik et al., 2017），家庭婚姻质量程度与父母教养能力感密不可分。对于属于教养能力感一部分的教养效能感，父母婚姻质量与其教养效能感存在正相关（Kwan et al., 2015），但是，母亲婚姻质量与父亲的教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随着母亲婚姻满意程度下降，父亲对养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程度增加（Kwok et al., 2013）。已有研究又表明，父亲婚姻质量可预测父亲教养能力感，父亲婚姻质量越高，其养育能力的感知越高（Bouchard & Lee, 2000）。那么，父母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有怎样的联系呢？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双方融于家庭相互影响，是否会更适应自己的角色并在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呢？本研究将据此进一步探寻两者间的联系。”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对“婚姻质量——教养能力感”这一影响路径加强了其中的逻辑说明，并在此补充了影响机制的理论支撑与合理化依据，具体如下。

“家庭系统理论中的相互依赖与影响表明父母教养子系统中角色的能力感与婚姻功能之间存在重要联系（Cox & Paley, 2003）。婚姻子系统中的婚姻质量有助于促进亲子子系统的发展（Cox, 2010），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在家庭中倾向于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开放性的交流与情感表达便于父母觉察孩子的需求，给予孩子指导与鼓励，履行较好的教养角色，增强与孩子间亲密关系（张晓 等, 2017; 杨晓静 等, 2021）。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中伴侣支持和婚姻维持行为被认为是教养能力感的重要预测因素（Suzuki, 2010; Merrifield & Gamble, 2013），婚姻质量高的父母懂得彼此支持与理解，维持良好的婚姻行为，更有可能接受与认可作为父母的目标与期望，进而引导自己作为父母角色的意识与履行相应职责。同时，研究表明，父亲婚姻质量可正向预测父亲教养能力感（Bouchard & Lee, 2000）。邢凯等人（2019）研究表明，父亲婚姻质量越高，对孩子的教养角色感知越高，进而父亲对孩子的养育投入越多，以此拥有良好的父子关系。从长远来看，婚姻质量不佳形成的婚姻压力和孩子外化行为正随着

批注 [A13]: 从前几句话到这句话，中间的跨度有点大，缺少必要的逻辑。另外，感觉在机制的说明方面，缺少理论支撑，更多的是基于三个变量中两两变量之间存在关系，就推导出一个中介模型出来

批注 [A14R13]: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已对“婚姻质量——教养能力感”这一影响路径加强了其中的逻辑说明，并在此补充了影响机制的理论支撑，具体内容已补充在文章中。

时间的进程共同发展,父母教养能力感可以帮助解决由婚姻质量不佳造成孩子行为问题(van Eldik et al., 2017)。

对于属于教养能力感一部分的教养效能感,父母婚姻质量与其教养效能感存在正相关(Kwan et al., 2015),但是,母亲婚姻质量与父亲的教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随着母亲婚姻满意程度下降,父亲对养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程度增加(Kwok et al., 2013)。那么,父母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有怎样的联系呢?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双方融于家庭相互影响,是否会更适应自己的角色并在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呢?本研究将据此进一步探寻两者间的联系。”(正文第7页)

意见 7: “由于教养能力感评估的是父母双方个人的养育认知,而不属于一个共享的家庭层面,即不是一个共同命运变量,其需要在个人层面进行分析。”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仔细考虑了编委专家说明的“母亲的守门员效应”,我们对“教养能力感评估需要处于个人层面进行分析”的这类表述进行了优化,以更恰当地表明本研究将教养能力感趋于个人层面分析的依据,具体如下。

“对于教养能力感,父母双方在教养能力感中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但相对而言,教养能力感评估的是父母双方个人的养育认知,其更具独立性,考虑为共享的家庭层面变量有所欠妥。本研究将其考虑在个人层面进行分析,不为共同命运变量更为恰当。”(正文第8页)

意见 8: “研究假设 4: 父母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见图3)。”

回应: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对婚姻质量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补充了合理化理由和证据,具体补充内容与“专家意见 6”相同。

即,“家庭系统理论中的相互依赖与影响表明父母教养子系统中角色的能力感与婚姻功能之间存在重要联系(Cox & Paley, 2003)。婚姻子系统中的婚姻质量有助于促进亲子子系统的发展(Cox, 2010),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在家庭中倾向于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开放性的交流与情感表达便于父母觉察孩子的需求,给予孩子指导与鼓励,履行较好的教养角色,增强与孩子间亲密关系(张晓等, 2017; 杨晓静等, 2021)。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中伴侣支持和婚姻维持行为被认为是教养能力感的重要预测因素(Suzuki, 2010; Merrifield & Gamble, 2013),婚姻质量高的父母懂得彼此支持与理解,维持良好的婚姻行为,更有可能接受与认可作为父母的目标与期望,进而引导自己作为父母角色的意识与履行相应职责。同时,研究表明,父亲婚姻质量可正向预测父亲教养能力感(Bouchard & Lee, 2000)。邢凯等人(2019)研究表明,父亲婚姻质量越高,对孩子的教养角色感知越高,进而父亲对孩子的养育投入越多,以此拥有良好的父子关系。从长远来看,婚姻质量不佳形成的婚姻压力和孩子外化行为正随着时间的进程共同发展,父母教养能力感可以帮助解决由婚姻质量不佳造成孩子行为问题(van Eldik et al., 2017)。

对于属于教养能力感一部分的教养效能感,父母婚姻质量与其教养效能感存在正相关(Kwan et al., 2015),但是,母亲婚姻质量与父亲的教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随着母亲婚姻满意程度下降,父亲对养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程度增加(Kwok et al., 2013)。那么,父母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有怎样的联系呢?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双方融于家庭相互影响,是否会更适应自己的角色并在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呢?本研究将据此进一步探寻两者间的联系。”(正文第7页)

批注 [A15]: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父母的教养效能感除了自身的作用外,也建立在对方对自己的教养方式的评价以及反应,就像母亲的守门员效应那样,如果母亲更多地容许父亲参与孩子的教养,父亲的教养自我效能感就会增加,如果母亲将父亲排除在孩子教养之外,父亲就很难就效能感。

批注 [A16R15]: 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仔细考虑了编委专家说明的“母亲的守门员效应”,我们对“教养能力感评估需要处于个人层面进行分析”的这类表述进行了优化,以更恰当地表明本研究将教养能力感趋于个人层面分析的依据,具体内容已补充在文章中。

批注 [A17]: 在上面的综述中,还需要更好地找到婚姻质量影响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合理化理由和证据

批注 [A18R17]: 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对婚姻质量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补充了合理化理由和证据,具体内容已补充在文章中。

意见 9：“本研究在两个时间段（T1 和 T2，两个时间段间隔 1 年）向 721 个家庭父亲和母亲收集了相关问卷数据，经过被试流失、无效数据（胡乱填写和大面积未填写）作答的仔细筛选，以及基于本研究背景需要，剔除单亲家庭（13 个家庭）、重组家庭（5 个家庭）的被试群体，最终获得 650 个有效普通家庭数据（包括父亲和母亲），数据整体回收率 90.15%。其中，在孩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为 31.48 ± 4.28 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29.52 ± 3.77 岁。在家庭初次调研时，家中孩子的平均年龄为 5.14 ± 0.74 岁。”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对被试选取的地方、范围、方法等信息进行了补充，具体如下。

“本研究在上海核心区、中间区和边缘区，根据幼儿园园所密度和园所等级（示范园、一级园和二级园）进行分层整群抽样，最终共抽取 12 个幼儿园参加本次研究。在两个时间段（T1 和 T2，两个时间段间隔 1 年），本研究向幼儿园中孩子的 721 个家庭父亲和母亲收集了相关问卷数据，经过被试流失、无效数据（胡乱填写和大面积未填写）作答的仔细筛选，以及基于本研究背景需要剔除单亲家庭（13 个家庭）、重组家庭（5 个家庭）的被试群体，最终获得 650 个有效普通家庭数据（包括父亲和母亲），数据整体回收率 90.15%。其中，在孩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为 31.48 ± 4.28 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29.52 ± 3.77 岁。在家庭初次调研时，家中孩子的平均年龄为 5.14 ± 0.74 岁，年龄范围 4~7 岁。”（正文第 10 页）

批注 [A19]: 需要说明是从什么地方选取，多大范围内用什么方法选取？孩子的年龄段是啥

批注 [A20R19]: 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我们已对被试选取的地方、范围、方法等信息进行了补充，具体内容已放入文章中。